

社造如何可能？

一 以新港社造「在地化」歷程為例

李榮麟^①、楊弘任^②

一、前言

在八〇年代的社會轉型中，風起雲湧的改革呼聲彷彿火苗四處竄燒。1987年夏夜，雲門的返鄉演出如同引信將這股火苗轉接到小鎮新港。於是，新港偶然成了社區重建的先鋒之一。試圖以「推展文教活動」、「改善社會風氣」、「充實精神生活」、「提高生活品質」來解決「大家樂風行」的新港文教基金會，迅速在幾年間打着「藝文推廣」、「環保教育」、「地方史重構」的旗幟回應八〇年代的社會驅動，「觀念啟蒙」與「共同感建構」在一次次次的藝文表演、環保教育、笨港史論戰中不斷傳遞和萌生。到了九〇年代，這股變動經由文建會的吸收、轉化與結合，適度回應及接收了八〇年代的社運風潮與本土認同，也順勢結合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論述，接掌了社政體系三十年來的社區主導權。因而，強調由下而上、居民參與、愛鄉愛土的「社區營造」慢慢具體成一波波政改策浪潮，期望能改善社區環境、凝聚社區意識、建立社區特色、提升地方產業及鼓勵居民參與公共事務。

早年的基礎讓新港輕易在1994年的全國文藝季獲得迴響，因此首波以「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與「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的社造浪潮洶湧地拍向新港。自此，新港才透過「美化造街」將當時流行的「社區營造」納入原有的社區重建中。然而，提早反應社會變動的新港似乎沒有在造街中討到便宜，完成的大興路與遭到否決的中

①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與環境研究所研究生。

②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山路幾乎都被認定是「失敗」的。值得探究的是，造街的終止並並沒有讓新港社造跟著停頓，尤其幾年後街面的鐵路公園完成和邊鐵村落落的自主啟動，標舉了新港社造的新趨勢，一方面，基金會內部不斷進行「組織轉化」，逐漸導向分工與集體領導；另一方面，以「社區改革」為號召的基金會逐步與農會、公所、社團、廟宇等既有組織有了進一步銜接，使之加入廣義的社造行列；最後，早期以街面四村為核心的社區活動逐漸擴及邊鐵村落，並帶動一股村落間的綠美化風潮。這一歷程，我們姑且稱為社區營造的「在地化」。

弔詭的是，社造標榜的不就是「由下而上」、「從在地出發」嗎？其實這只說對了一半，就基調而言，社造的確比解嚴前的「社區發展工作」更為強調居民參與，但在基本架構上，某程度仍擺脫不了「由上而下」，因為多數地區仍依賴政府的政策引導、資源補助、或專業團隊的進駐，因此社區能否自主性運作，才是由下而上的關鍵。其次，我們認為社區是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場域」，雖然它隨外在環境變動，卻也有自身的步調，因此新觀念的帶入勢必得與在地場域中既有的歷史、組織、政策、關係網路相互揉合，將雙方「關注的興趣」導向一致，使之鑲嵌在常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說，若將社造理所當然地視為由下而上，那麼很容易忽略「行動者」在場域裡的施為，以及輕忽「經驗疏遠」與「經驗親近」^③的差異。這即是我們所說

③ 「關注的興趣」這一概念取自人類學功能論取向的Evans-Pritchard (2002 [1940])。他以「關注的興趣」來解釋努爾社會為何對牛高度專注，將此「興趣焦點」置於對「生活有用」著特，也就是基於有用才不斷被認識與分類，而這樣的焦點同時展現現在對牛的「維生經濟」與「文化界定」上。簡單來說，Evans-Pritchard提示我們：若要對努爾社會生活有所瞭解，當先掌握他們用來指涉牛的地在意義，尤其是對牛的價值觀與高度專注如何與環境、政治、文化等有所關連。

④ 「經驗疏遠」與「經驗親近」的觀念來自Geertz (2002 [1983])。他認為「常識」不是所謂的「自然本性」與「理所當然」，而是一種「文化體系」（如專家、普遍特種的觀念）的「經驗疏遠」（泛指自發的、日常的、習以為常的語言、生活、感受與知識等）即是一種「常識」，根據「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準則在處付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簡單說，「經驗親近」即是Geertz界定的「在地知識」，而此知識不是來自自定的時間與空間，而是一種「音調」與「音高」的組合，一種日常的、自發的調查。

的「在地化」⁹概念內涵。

因此，我們試著這樣問，從雲門下鄉到推舉鄉長、從改善風氣到社區營造、從造街到鐵路公園、從核心街面到邊線村落，一個「藝文」意象如此鮮明的組織如何做到？造街之後，新港如何避開一般常見的依賴專業團隊、地方派系把持、公部門收編等社造困境？並進一步讓各個村落逐步自主運作起來呢？

二、從「經驗疏遠」到「經驗親近」：示範式行動的修正

自1987年雲門返鄉演出之始，新港以「藝文」為主的行動基礎似乎就這麼定了下來，國內較知名的藝文團體在新港進進出出，無疑是八〇年代社區抗爭風潮中的殊例。若說是林懷民把這顆種子撒到新港，那麼返鄉開業的陳醫師毋寧是細心照顧樹苗的園丁，扮演在地場域裡的「知識領導者」，為新港的未來來來訂方向、診斷問題、提供點子與計畫、轉介新的知識、觀念及理念。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當時台塑企業在中洋村設立的「淨港計畫」、「撿拾農藥瓶」、「巡迴教育」、「環保示範家庭」；藝術表演中的「戲劇表演」、「演講活動」、「書畫展覽」；歷史文物研究中的「笨港史說從頭」、「鄉土采風營」等活動¹⁰，都還是屬「示範式行動」層次，試圖利用宣導、論述、教育與建構的方式為民衆帶來觀念、改善風氣、提供新的想像，或

是提供別於電子花草與大家樂的另一種選擇。這樣的起手式為八〇年代的南部小鎮帶來了文化震撼，很快地給了民衆機會教育的場合。

雲門舞集是我們鄉下人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嚮往的表演，可是居然在一個小地方發生了，在一個那麼簡陋、克服困難的場地表演，那種感動會讓我們覺得要去珍惜他。當然，在那一場裡面我們就會得到一些教育，譬如司機一再叮嚀請各位觀眾不要抽煙、不可以攝影、不要到處走動，在那邊已經教育了一個最好觀眾應該具備哪些條件。而且我們在看一個國際級表演時，怎麼好意思穿拖鞋去；每次大家都會接受到這些訊息，然後大家就會彬彬有禮的去表演，大人也會告訴孩子不要亂跑。當然這種事情是被薰陶、訓練出來的，其實蠻快的¹¹。

儘管「示範式行動」能夠帶來觀念的革新和一定程度教育效果，但現象的另一面卻是在無意間隱含了「文化資本入場權」，無法輕易地讓「人人跟著做，而且做得來」。儘管這樣的「場域¹²排他性」能夠一連吸引了「容易體會這種東西」的學校教職員成為義工基礎；一邊避開具有派系習性的草根頭人把持組織。但也因文化資本與地域限制構築了門檻而被「鄉民形容水準太高難以接受」，甚至因成員多是老師與公務員，以及活動幾乎集中在街面四村而被定位成「比較中產

⁹ (960315路教老師)、(960302坊吳老師)。

¹⁰ 「場域」的概念來自Bourdieu，而這個概念也是Bourdieu比布希歐階級主義更進一步的闡發，一方面，Bourdieu提出結構元素的動態運用；二來以「場域」的概念來分析早期結構主義只有一層對立結構的說法。關於結構元素的動態運用可見Bourdieu對家宅空間的分析(2003 [1980]: 425-444)，簡單來說，他認為經過家宅門派，雖然對立關係存在，但整個結構關係的任意性正好倒轉，門派內外各是不同的場域，各有不同的象徵對比與結構意義。總而言之，Bourdieu的家宅分析提醒我們特定的場域有其實踐邏輯，而這種實踐感是一種排除計算、不完全自覺的意識，是實作原質的「不成文辭語」，因此要看看在場域的實際運作如何。

¹¹ 林輝雄：2003：53。

¹² 實際上，林秀幸(1997)在〈重建鄉村社群：新港文藝基金會的成立過程與組織探討〉一文中，就曾以「在地化」形容新港文藝基金會與社區發展聯盟的聯結與整合。不過，該文是以基金會董事會從第一屆的「非在地人」轉為第二屆屬廣的鄉親團董會長、團中小校長、農會總幹事等地方人士的「加重在地董事比例」做為論證依據。我們認為這樣的推論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一來容易忽略鄉民社會「樹名」的組織特質；二來除了單以組織章程變化推論外，更可進一步加賦考察地方事務的實際運作如何。

¹³ 街面四村係指大興村、福德村、官前村、官後村。

¹⁴ 具體細節可參見，新港文藝基金會，2000，《新港新港》。

階級」、「無法回應農民想法」、「只做街面」^①。最為傳神的認知是，「對基金會不太瞭解，沒在理...因為不識字」；「基金會只做文化，不做社區」。這樣看來，基金會的出現不過讓新港多了一個專司藝文的團體罷了。但事後來看，新港的社區運動若只停留在這個階段，還有可能達到前述的「在地化」嗎？

較少人注意到的一面是，基金會內部其實對初期「放煙火式」的外來團體表演有著進一步反思，很早就想把短暫的表演轉為社區經常性活動的念頭，而這樣的機緣則要從首任總幹事鄭老師於1989年當選鄉長開始說起。鄭老師離職擔任鄉長後，總幹事一職的空缺讓陳醫師找上了同在新港國中任教的張老師。然而，年僅35歲甫接總幹事的張老師卻在1990年碰上陳醫師出國進修一年，這對向來仰賴陳醫師帶頭領導的基金會來說，毋寧是個小小考驗。不過，卻也帶來領導風格轉型的契機。這一年，擔任總幹事的張老師將兩週開一次會的「義工幹部會議」調整成集體決策模式，由十來位義工與三位秘書組成的決策小組共同決議，其中延續至今的全鄉籃球門牛賽、KTV比賽、健行活動都在這年逐步開展。於是，大型的、短暫的、外來的團體表演導向每年經常發生的社區性活動，以及將活動導向邊緣村落的作為有了起頭的第一步。這一事件影響所及不單是基金會決策模式的轉變，更為關鍵處則是擴大了「共同關注的興趣」和「義工來源」。

以大年初三舉辦的籃球門牛賽來說，從剛開始每隊5人的2、30隊到十七年後的6、70隊參與，確實達到了「提倡大家來運動」和改善大過年老是喝酒、打牌的交誼方式。另外，被定位為「用歌聲代替對抗」的KTV比賽，以及以新港為範圍的健行活動，起初也探

用了東南西北四區的競賽模式與行走路線，如此一來，卡啦OK適度取代了脫衣舞表演、村落與村落間有了交集與認識，基金會也在「圖書下鄉」之外賦予了民衆參與「藝術下鄉」的可及性。不過，這樣就足以比「示範式行動」更能擴大義工來源與共同關注的興趣嗎？

進一步的轉化效果應從「協力社團」的出現就起。當KTV比賽、籃球門牛賽及健行等活動隨著一年的舉辦而不斷累積人力時，基金會採取了一個活動再輔導成為「社團」的方式將主導角色轉為支援協辦，其中1993年成立的KTV歌唱聯誼會就是此種以興趣結合的「新興社團」類型，不分地域、階級將新港愛唱歌的人聚集起來。至於籃球門牛賽及環保健行，則是為了避免社團角色有所重複，因此採以「活絡既有社團」的方式移轉給原先功能不彰的體育會舉辦。值得探究的是，於八〇年代開展的生態思潮在這個南方小鎮發散時，扮演觀念領導角色的基金會自然不會錯過，九〇年代初期的「掃街淨港」、「撿拾農藥瓶」、「巡迴教育」、「環保示範家庭」、「認養新港公園」就是在這個脈絡下醞釀而生。但鮮為人知的是，當基金會在1992年初召集太極拳、外丹功、慈濟、早覺會等團體成立「拳園社」共同認養新港公園時，民雄農校畢業、開設電器行的首任社長阿敏早在八〇年代起自行修剪公園內的枝葉。然而，這樣的行動類型與KTV比賽、籃球門牛賽或藝文教育有什麼差別呢？

有「年輕耆老」之稱的阿敏生於昭和16年(1941)，雖未受日式教育但仍經由民間放映的日語電影和家中長者不時唱起的日語歌曲自學日文而成。對日文歌尤有興趣的阿敏家中擺設了許多日文唱片與歌本，這樣的興趣使他早在基金會以賞金三萬元打算為日治時期的「新巷庄之歌」^②徵求國語歌詞之前，就已在1972年找出來教唱，更於

① (960323坊蔭教社)、(960430坊壽老耆)、(960518坊阿三哥)、(960328坊黃村長)、(960302坊吳老師)、(960309坊蔡村長)、(960328坊陳村長)、(960416坊阿村長)、(960513坊高老師)、(960611坊阿瀾、姚小姐)、(960525坊阿麗)、(960427坊阿和)、(960412坊阿武)、(960515坊阿鳳)、(960502坊阿琴)、(960607坊阿琴)。

② 這首「新巷庄之歌」係由新港第三任庄長廖瑞平即出賞賞金80元由林錦輝作曲完成，爾後在基金會的徵求下由新港國小蔡永隆校長出題，成為今日的新港鄉歌(950918坊阿龍)；(新巷庄耆耆覽)。歌詞是：「新港是個好地方，崇書文風強；地靈人傑民安泰，代代出賢良；花生芝麻福未嘗，新港船塢揚；閩台媽祖人人仰，德澤被四方；榮、榮、榮、榮，建設新港好家鄉。」(新港國民小學創校一百週年特刊)：30。

前數年於奉天宮廟口大合唱。但這樣的個別行動與「認養新港公園」有什麼關係呢？有趣處在於，不論修剪枝葉還是唱唱日文歌，原先看似影單形隻的個人興趣，卻在1992年頭、年尾組成的「馨園社」與「馨園吟詠歌會」中，無意間誘發出一群留有日治時期歷史「習性」的人參與，在清潔新港公園同時，也唱唱新港老歌，並因此形成新的行動類型。阿敏笑稱：

因懷念年少時代的美好時光，大體都以日本老歌為主，雖然一開始吟詠歌會的人數不多，但後來最多達到87位，且這群人成了基金會辦活動時的基本班底，要是聽演講缺人，只要吆喝一下，就會有好幾人參加。

在外來刺激不斷的年代，林懷民、陳醫師等率先想著家鄉面臨到的種種危機，試著盡早讓在地場域中的民眾也接收到政治結構鬆動、社會運動風潮下的新社會想像。無奈初期的「示範式行動」雖帶來觀念啟蒙的效果，卻仍無法毫無扞格地讓多數鄉民瞭解到這些「經驗疏遠」的概念。某程度而言，1990是關鍵的一年，社區化、常態化的活動踏出了「經驗親近」的第一步，在自發與不自覺的行動類型中達到了改善風氣的原初目的，並帶來擴大義工來源的附帶效果。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初期「示範式行動」的重要性，否則KTV比賽、籃球鬥牛賽和環保健行只會侷限在單純的娛樂行動，無法內含革新的行動

⑬「習性」的概念係自Bourdieu(2003[1980])。他認為實踐活動不只是角色的動作，其構成層則是「有結構」的和「被結構化」的行為傾向系統，亦即「習性」。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強調擺脫對的能購買在參與絕對的主觀主義，認為在客觀的可能性中存有主觀的渴望，因此習性是無限又有限的實踐，是一種學習來的和有條件的，所以在結構之中產生習性，再藉由習性支配實踐。簡言之，Bourdieu提示我們：「集團或階級習性的客觀一致性源於生存條件的一致性，致使實踐活動能在客觀上趨於一致，而與現任何客觀考慮和有意識地參照某種規範，而且使他們在沒有任何直接作用，特別是沒有任何明確協商的情況下能夠相互調整」。換言之，結構使人具有潛在的行為取向，如閃爍有聯環相扣的交響樂團，但以習性來指揮與建構。

意涵與新的社區想像。所以，我們不傾向以「整合」、「收編」等強勢字眼命名基金會與其它社團的關係網路，因為不論是「興趣集合」的KTV歌唱聯誼會、各式舞蹈社團；「活絡既有社團」的體育會；還是結合「日常實作習性」的吟詠會，當中都意涵了在「經驗疏遠」與「經驗親近」之間「找出雙方共同關注興趣」。這即是新港社造「在地化」的首要層次，也因此，當多數焦點都放在林懷民的推波助瀾、媒體建構，甚至是國家資源挹注新港之時，這些「協力社團」與義工正悄悄成為官方社造來臨前的堅實基礎。

1994年，文建會提出了別於解嚴前「社區發展工作」的「社區總體營造」，試圖將由上而下進行資源分配的社區工作轉為強調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和社區意識建構。有了前述基礎的新港被選為「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與「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的四個示範鄉鎮之一，於是「參與式規劃」的概念隨著規劃團隊的進駐帶了進來，首階段的主軸即是市街的整建^⑭。然而，前述的基礎並無法在「參與式規劃」中體現效果^⑮，反倒令人玩味的是，儘管中山路造街停擺，但緊接而來於1998年承辦的「國際藝術節」，卻又充分發揮先前累積的基礎，即使首次承辦的國際活動得到官方不少的資源補助，但不應忽視在那個時間點上，台灣仍少有鄉鎮具有如此的行政籌畫能力與義工參與基礎，再者，往後幾次的國際活動也是在經費逐屆減半的狀況下舉辦完成。也許可以這麼說，新港這些年來的「國際化」轉型，藉助的正是前述層次的「在地化」基礎。不過，這樣就足以宣言社造「在地化」了嗎？

⑭關於造街過程細節可參見：李芳玲，1998。

⑮如李丁讚(2004)認為這是在因為支持的人以道德的、專家的優越性把對其文化保留的人看成自私自利，在沒有私下與日當的清通下，公共論述的觀感性無法展開。或如李芳玲(1998)認為這是地方知識菁英與中山路居民之間，對公共利益思考與行為的落差。

當這段期間的所有焦點都放在街面如火如荼進行的造街時，有件相對不被關注的行動正悄悄突顯出前述在地化基礎的不足之處。這個事件是1996年由天下雜誌發起的「清淨美麗家園」。關鍵的插曲就是開設相館，學習易經多年，對地方事務有獨特解讀的阿三哥意外接掌活動副總幹事。阿三哥觀察到，「基金會成立後，都是莊腳義工來街上」，以及「社區的能量要怎麼讓它出來」等關鍵問題。於是，阿三哥將學習易經的心得轉化到活動實踐上，以一個稱之為「羅盤理論」的概念作為活動基調，試圖讓「義工回歸社區，站到羅盤上，自己撐、自己動」。

……一方面透過村落原有的組織，包括婦女會、家政班、後備軍人；另一方面透過掌握村莊行政與人脈的村幹事和村長。重要的是，我要他們把村裡有參加新港社團的名單列出來，開始把這些來新港做義工的人回歸到社區。我比較感到安慰的是西庄，那次活動後每年的謝平安都會自己組義工團，繞境過程裡後面跟著棒。

這個行動類型較之「協力社團」與「示範式行動」的突破性在於：其一，「協力社團」無法全然克服核心村落與邊緣村落的落差問題，即如造街或國際藝術節，都還是停留在從邊緣集中到核心層次，次場域裡的在地組織並沒有跟著運作。其二，「協力社團」雖能巧妙避開社區內部對手，但觀念要深化、人群要動員，首要面對的就是村落場域中的既有組織與人群網路，但「示範式行動」或「協力社團」只能將可以最快速接收與改變的人吸引到街面核心來參與活動，而不是直接面對村落裡的內部問題，造街遇到的困境即是個例子。不過，這個活動固然有突破性，但「非例行性」與「非村落自主」的活動性質仍有某程度的偏限性，實際促使「在地化」的事件是鐵路公園的完成

基金會董事的改選。在這之後，走了多年社區運動的新港，才算真正走入邊緣村落，並影響到村落組織的運作轉化。然而，關鍵性的行動卻不是大型藝文團體的表演，也不是嘉年華式的國際活動，逐漸在各村落形成一股動員風氣的，反而是偶然啟動的「環境綠美化」。

三、從「理念先行」到「實做先行」：綠美化風潮的開展

那麼，值得探究的問題來了，是什麼因素開啟這股「環境綠美化」風氣？為何「環境綠美化」可以帶動村落層次的公共事務參與，甚至進一步成為新港的集體風潮呢？



(新港鄉村落圖)

事件的開端要從街面的宮前村開始整理屬台灣糖業公司的舊鐵道說起。這塊位在奉天宮前不遠處的舊鐵道，實則在1996年天下雜誌舉辦的「清淨美麗家園」活動中，已被鄉公所列為清潔區域。只不過，卡在土地使用權問題，讓有意清理的基金會環保綠化組只能「稍做割草」。活動後不久，現任的宮前村長阿益，在還未參選之前就與友人動手整理，不過此時除了冷言冷語的嘲諷外，台糖也登報反對阿益的清理行動。於是在2000年時，阿益一邊在基金會義工協助下一口氣將東側土地整理完畢；一邊請當時剛就任基金會董事長的阿煌，一起向台糖說明。直到2002年，折騰許久的鐵路公園才算正式完成。鐵路公園的完成突顯了兩個重要意涵，一方面，當專業團隊、鄉公所與基金會都在為宮前村的中山路造街提出願景時，村長阿益心裡想的卻是自小生活的土地怎麼變得如此航髒，所以營造街團隊不斷舉辦說明會說服住戶時，阿益選擇了自己動手整理這塊荒地。無疑的，這個行動又一次突顯了「經驗親近」與「經驗疏遠」的差異。

事件	發動者	方式	居民感受
中山路造街	專業團隊	參與式規劃 ^⑩	經驗疏遠
鐵路公園	村民	帶頭實做	經驗親近

另一方面，與中山路相鄰的鐵路公園能夠完成，給予造街失利的基金會不小鼓舞，自此確立了往後幾年新港環境綠美化的走向，關注焦點一定程度地從藝文表演轉向村落綠美化，甚至，基金會也觀察到環境綠美化與「協力社團」的差異。現任的基金會董事長張老師道出比較：

⑩當時所用的參與規劃方式有：社區討論會、個別訪談、幻燈案例介紹、文宣告知、圖繪說明、模型解說、設立社區工作室、外地社區觀摩、社區聯誼活動。詳見，淡水文史工作室，1996，《編譯其文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示範點——新港鄉規劃調查》。但有不少受訪者指出，這樣的參與式規劃忽視地方民情中「不支持就不參與活動」特性，以致無法全然反應居民切身所當的聲音。

…早期舉辦 KTV 等活動是希望在花錢請來的、外來的活動中有些社區性的活動，但畢竟 KTV 是一年多才發生一次，雖然平常會練歌，但還是屬於個人娛樂，不是公共議題與社區的參與。影響比較深遠是綠美化這種，因為這與日常生活更結合、更深遠，而且在各村會發展成組織，然後變成經常性的活動，否則環境亂七八糟，講雲門來有什麼意思…

對比早期屬「示範式行動」的環保教育來說，鐵路公園被認為「比較看得到的成果」，多數鄉民在這之後逐漸認可基金會「有改變」、「有做社區」。不過，這只構成「在地化」歷程的第一步，雖然許多村落在此之後受到間接鼓舞而群起效尤，但從邊緣看回核心，鐵路公園等街面環境綠美化仍屬經驗疏遠項，因為「基金會的規劃未必適合當地」。若進一步探究，我們發現，綠美化能在新港蔚為風潮，並形成邊緣村落與基金會之間彼此經驗親近的「關注興趣」，關鍵突破乃在於邊緣場域與核心場域各自出現「以實做銜接計畫」的機制。如此一來，基金會早期的社區改革理念方能落實在邊緣場域之中，而個別村落的行動才得以連結成整體風潮。先從核心場域來看，「以實做銜接計畫」的機制和促成邊緣場域綠美化風潮的關鍵，要從基金會2000年的董事改組說起。那一年，領導基金會多年的陳醫師為了佈局日後基金會的接班問題，決議在董事之間增聘一位副董事長。在這當中，早年開設碾米廠，地方形象良好，素有「三好一公道」^⑪稱譽，並當選基金會第三、第四屆常務董事的阿煌就在眾人支援下當選。兩個月後，說是機緣也好，提早接班也罷，已任職董事長十多年的陳醫師隨著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而被延攬入閣擔任政務委員。於是，阿煌接手了新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自此，基金會，甚至是新港的發展開始進入不一樣的型態。

⑪ 甲身體好、經濟好、關係好、做人公道。



雖然 1990 年已有義工幹部會議來形成集體決策，但當時多數人對社區還沒有很好的概念，所以都還是跟陳醫師走，最終仍以陳醫師的決策為決策。因此阿煌接掌基金會初期，便密集地舉行臨時董事會讓大夥腦力激盪，一起規劃沒有陳醫師領導的基金會走向。在這之中，阿煌做了三個影響日後新港發展的決定：其一，將過去由陳醫師一人擔著走的領導模式調整為董事內部的「分工」。其二，除了延續基金會既有工作外，阿煌自認無法像陳醫師那樣經營對外關係，所以將自己定位在經營社區及整合地方資源。其三，將基金會可以拿到的案子延伸到邊緣村落，尤其是社區產業、社區觀光與環境綠美化。所以在鐵路公園完成，以及阿煌接手董事長後，新港文教基金會開始積極投入社區環境綠美化，比較顯著的行動可分為三個面向：第一是從街面出發，於 2001 年開始舉辦「社區清潔日」，除了消除街面四村多個髒亂點外，也進一步將其中心一些美化為小花園。第二是擴及至邊緣村落，從 2003 年開始舉辦「新港鄉庄頭綠美化交流活動」，期望透過交流活動讓各村村民瞭解各村樣態。第三是經手的計畫案轉變，尤其是 2003 年基金會以「微笑新港—文化休閒產業園區」為主題，獲得的行政院社區營造計畫心點子規劃案，便試圖透過「人文歷史」、「田園風光產業」、「王得祿歷史巡禮與精緻產業」三個園區做為資源連結路線，將既有的產業、古蹟、景點、以及如中庄、菜公、咬仔竹、溪北等邊緣村落營造點網羅其中。

顯然，基金會日後的發展走向很大程度來自兩人領導習性的差異。在鄉民眼中，陳醫師被拱在「新港精神領袖」的制高點。侃侃而述的觀念大家雖會「尊敬」與「跟隨」，但其領導特質也被定位成「講理念」、「理想化」、「文人性格」、「有距離感」。至於阿煌的領導特質，則是被認為「易親近」、「很本土」、「博感情」、「沒派系」、「人人好」。然而，我們認為關鍵差異不在能否跟鄉民「博

感情」。在鄉民分類中，陳醫師甚至是尤為特殊的醫生，不但願意回鄉奉獻，還具有一般醫生沒有的「味道」，可以在看完診後跟鄉民喝酒、打球、博感情，也會騎著單車巡庄頭。我們反倒認為，具體的差別在於領導習性。

...陳醫師比較會講理念給你聽，他很關心社區、也來看我們割草，但可能是比較沒時間的關係，多是透過管道來關心社區，比較少親自下來做。阿煌比較會親自參與，像割草、搬椅子他都跟你一起做⁹...

簡單來說，陳醫師較以「理念先行」，阿煌則以「實做先行」。這樣的習性差異，讓陳醫師多半在場域中扮演知識領導角色，為新港介新的觀念；提出具體的計畫和理念；阿煌則是扮演知識轉譯角色，儘管不能像陳醫師那樣打下外界關係與提出宏觀理念，卻能透過身體實做將基金會的改革觀念轉化到鄉民可接受的「經驗親近」層次中。

帶領者	領導習性	行動類型	社會角色	居民感受
陳醫師	理念先行	示範式行動	知識領導	經驗疏遠
阿煌	實做先行	實做式行動	知識轉譯	經驗親近
專業團隊	計畫先行	論述式行動	知識專家	經驗疏遠

⁹ (960607游阿華)；(960427游阿和)。

因而當阿煌先後接掌基金會、農會與鄉公所後，都能夠適度地將基金會理念運用在其它場域之中。具體來說，即是當各個屬性不同的村落向農會、基金會或鄉公所^②要求協助或計畫補助時，表面看似「計畫先行」，但另一面卻是阿煌「以實做銜接計畫」，到各場域中親身實做，如此才能將不同場域之間的經驗疏遠轉化為經驗親近。

……鄉公所經費一直都很少，大型建設只能聽天由命，要經費、討建設我也不會給。但沒錢有沒錢的作法，我現在基金會學到的運用民間資源拿到公所用，像是社區內部主動要做些事並願意自己出人力，除了工錢外，我都願意幫忙出重機械、植栽、飲料這些。或是用清潔隊為主去帶，但不是幫他們掃社區，而是整理出髒亂點鼓勵做綠美化……

……阿煌不管當農會理事長、鄉長還是基金會董事長，都還是會利用空閒自己整理空地或髒亂點，假日經常可見阿煌全家在維護公園，社區需要幫忙，阿煌有時也會帶義工或重機械去幫他做……

我會當村長是阿煌叫我做的，因為我在村裡比較有人，而他也重綠美化，可以跟他配合^③。

無疑的，經過基金會洗禮的阿煌可能是台灣極少數用社造概念推助地方事務的鄉長，而重視環境綠美化的作風與「實做先行」的領導習性帶進公所後，更是直接扮演新港綠美化的推手，也間接讓討論建設、要經費習性的村長不得不換個方式，要不自己來做，要不成立村落

② 阿煌於2005年被推舉出來參選鄉長，阿煌競選的情況下仍獲得15226票。
③ (960614訪阿煌)；(960613訪高老師)；(960525訪阿麗)；(960607訪阿華)；(960611訪阿蘭)。
④ (960321訪阿安)。

義工。那麼，再從邊緣場域看回核心，鐵路公園固然間接促使使各村落場域有人願意起頭，而基金會、農會與鄉公所在此之後也更重視社區工作與社區綠美化，但實際狀況還是仰賴「以實做銜接計畫」的機制，一方面是阿煌的領導習性將觀念與計畫帶了進來，轉化經驗疏遠為經驗親近；另一方面是村落場域浮現實做型的領頭人物，除了能快速捕捉到村民共同在意的經驗親近項，也能適度銜接經驗疏遠的改革觀念。如此，邊緣村落的經驗親近項也變成基金會的經驗親近項，反之亦然。以下，我們試著舉出三間村、萊公村、中庄村三個自主啟動類型作為說明。

萊公村的咬仔竹聚落是新港最早自主啟動的村落之一。當中的關鍵人物是開設電子廠、曾擔任過大樓型社區主委、1995年回鄉的阿淵。初回鄉的阿淵雖回絕村民邀約擔任社區理事長，但卻在日常實做中帶領居民做家戶綠美化與資源回收。到了2000年，萊公村的「社區理事會」在內政部要求下改為「萊公社區發展協會」^④，而阿淵也在此時被邀約進入協會擔任理事。就這樣，小聚落的社造概念架接在早年社區發展工作留下的組織逐漸運作起來^⑤。沒有專業團隊輔助的咬仔竹，在阿淵的秘書施小姐協助下^⑥，先後拿到縣府與環保署提供的計畫

④ 實際上，解嚴後的政權轉變和「社區理事會」未具法律地位的重要因素，讓內政每早在1991年頒布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中已將「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發展協會」，並解之定位為人民團體。參見：吳明傑、陳竹上，2005：135-139。

⑤ 另一方面，咬仔竹聚落能迅速運作，在於村裡積極募款、20多歲即參與農事研究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阿長願意配合也是關鍵。在阿長帶領下，留有良好的社區研究與家庭才幹得以動員。

⑥ 實際上，當阿淵與秘書施小姐在撰寫第一份計畫時，就因對新港不夠熟悉而無法應付計畫書文化的社區沿革，因而找上基金會幫忙。但這跟一般專業團隊輔助或找人代寫的申請書應不一樣，及建會社造中心未停歇前，對當時想申請計畫的社區來說，「寫計畫」與「核銷」能力構成一大門檻，所以有的社區招募、有的請專家學者代勞、有的則請在地學界高者幫忙。不過，即使社造中心學動開始重視這方面的人才培訓，但要應付官方瑣碎的流程與資料，還是得花一段時間跟會。就這方面而言，新港文獻基金會很早就擁有如此能力，這也是新港早期的優勢之一。不過咬仔竹聚落的過程是「以實做銜接計畫」，而不是「以計畫帶著實做」。



改善活動中心的硬體設施、整修球場、購置花苗及種植路樹。但更關鍵的是選定兩個社區入口作為營造點。不過，選擇社區入口的原因不是為了好看，而是因為嘉 68 號縣道不但是咬仔竹聚落唯一的出入口，也是通往中洋村與三間村的捷徑。然而，台塑中洋工業區的設立不但帶來空氣中的微微臭味，也帶來貪一時之快的上班車輛。於是多年來，倉促而過的車輛讓靜謐的小村落經常發生車禍，因而出入口成了村民最願意配合處理的「安全問題」。偶然的是，這兩塊地後來叫「微笑花園」和「三角公園」的空地於 2002 年整理好後，適逢基金會於 2003 年通過前述的「心點子計畫」，幫清理好的空地添加了涼亭、燈光、腳踏車步道、草皮換新等設施。於此，原本為了避免視線不良的自主清理才搖身變為新港文化休閒產業園區的示範點之一，小聚落的關注興趣也成了基金會與新港整體的關注興趣。

同樣的，2003 年，文建會與基金會配合的計畫也來到中庄村，準備在大水潭「中庄壩」入口處做一塊角落綠美化與岸邊整理，雖然順利完成，但因受限經費只做了一段。不過之後在村民自主出錢出力，以及透過傳統的找議員討經費方式，這段在 2004 年完成。單從表面看來，這樣的社造現象很容易被歸類為「國家資深挹注」或「基金會在村落插牌地旗」等刻板印象。然而，在看似「計畫先行」的運作模式中，中庄村內部早已隱含一套「實做先行」的基礎。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 1965 年次，在雲林麥寮六輕工業區上班的阿和。實際上，當 2001 年街面的鐵路公園逐漸完成時，看到街面成果的阿和也開始獨自在住家周圍進行清潔工作與簡單的綠美化，不過他認為基金會的規劃不一定適合當地，因而朝向自己規劃與整理。隔年，為了擴大參與，阿和藉著村裡的三山國王廟落成機會，辦了一個慶祝活動來讓村民認識較少與人交陪的他。因此當 2003 年文建會的計畫進來，以及基金會的義工配合做出示範點時，中庄村能夠很快銜接而上，

除了「中庄壩」是早期村民洗衣、洗菜等重要生活作息重心，能夠很快引起村民興趣外，阿和與部分村民先行一步的基礎更是關鍵。所以，「中庄壩」岸邊步道在 2004 年邊爭取經費邊做時，「中庄社區環保工作隊」也同時在籌畫，待整體工程完成，義工隊也順勢成立，讓偌大的岸邊維護有了著落。

至於三間村能夠啟動，關鍵人物是在農會推廣股任職的阿麗。阿麗以多年來推廣經驗告訴我們，其實農會在農村一直是重要的機關，很早就有產銷班、四健會、家政班在社區運作，也有如文化福利和教育訓練等推廣工作，但在未有社造概念的年代，組織運作只限於農會體系下的人群組合，教育訓練也只是找來農會上課與輔導。以新港農會來說，一直要到 2003 年接下農委會的「整合鄉村社區組織計畫」才將觸角更加延伸，不再限於農會組織。不過，就當阿麗帶著這個計畫分別在某公村（2003）、溪北村（2003）、板頭村（2004）推動時，阿麗碰到一個「經驗疏遠」的困境。因為這種推動方式讓阿麗覺得「做別人的社區無法深耕，這是自己不瞭解的地方」。於是，阿麗在 2005 年選擇自己生長的地方，「熟悉到不需任何資源調查就可馬上知道要做什麼」的三間村作為推動點。然而，阿麗的動機其實有更深層的一面，事件的源頭來自台塑中洋工業區的設立。當八〇年代末起頭抗爭中洋工業區的陳醫師反被台塑批為「地方惡霸」時，台塑正在三間村與中洋村做了一件名副其實的惡霸行徑。阿麗憤慨地說：

當年，台塑是民間企業，卻用政府的公告地價在收購土地，我們家的土地在三間算是數一數二大，但被收購就...我爸當時跟村長帶頭去抗爭，但村民覺得三間村很小，需要有人幫三間出頭，所以後來就被推舉出來選鄉民代表。像現在我們做的鐵路公園（三間的舊鐵道）、中洋沿線藍圖等構想，我爸爸當時已提出來了，只是做代表會否決而已。不過我爸爸只當了一屆就過世，所以其實我是抱著遺憾在做。

三間村早期的抗爭經歷讓阿麗回鄉的推動較無阻力，雖仍有少數的冷眼旁觀，但在既有地緣與網路基礎下，阿麗在三間的推動很快就順暢起來。除了村長願意配合、家政班的基礎成為義工隊固定班底外，曾在新港開設美術班、村民習得著老師的在地藝術家願意協助，更讓阿麗的基礎構思有了實踐的方式。不過，幾次的參訪經驗讓阿麗瞭解到「藝術造村」有其「經驗疏遠」的限制，村民若對藝術家設計出來的作品不瞭解、沒感情，反而會限制動員的能量。所以阿麗與蕭老師一方面試著將作品呈現出來的「象徵意義」結合至早期的抗爭經歷，讓規劃點不只是藝術品。例如入口處設置的「向前走」地標，一來紀念當時農民抵抗台塑強制徵收土地的流血事件，二來意味在這個不可抹滅的事實下，期盼農業與工業的融合，要大家「向前走」，不要往回看。或如另一個規劃點「長青樹」，乃意味在外來人口增加後變得冷漠的社區，能夠常保年輕的心，期望大家願意出來參與、終生學習。另一方面，阿麗與蕭老師朝著比較可以讓村民一起動手的方式設計規劃點，例如動用到很多人蒐集瓶子、接線完成的「煙樹」；或是利用「畫我家鄉」與「老照片蒐集」兩個活動成果呈現的「文化牆」。

社區是一個相對自主的場域，外來的刺激雖一定程度地影響場域中的行動者，但我們也一再看到這些行動者如何轉化這些「經驗疏遠」的概念，萊公村、中庄村、三間村所呈現的類型雖不全然相同，卻也反應出「經驗親近」的「關注興趣」還取有其重要性。鐵路公園的操作模式與基金會董事長阿煌的領導習性無疑是經驗親近的，但到了各個村落場域，各自的元素挪用與象徵排比又是另一套的親近選擇，三間選了昔日抗爭記憶，咬仔竹選了安全問題。但無論如何，透過綠美化這個媒介，基金會早期提倡的社區改革理念逐漸透過雙方「以實做銜接計畫」的機制導向一致。

四、結語

當多數印象仍將新港置於早年的雲門下鄉與造街規劃時，我們試著把植新港近年來發生的事件與行動，從不一樣的角度的看待新港。究竟，藝文意象鮮明的基金會自八〇年代以來的改革理念如何改變新港？九〇年代的社造浪潮如何可能？我們一定程度贊同早年「示範式行動」與「論述式行動」帶來的行動效果，無論如何，新港在社區能置、規劃執行、觀念提升等方面，著實是台灣鄉鎮中的翹楚。不過，若以新港整體性而言，這樣的行動類型卻也在動員幅度與改革深化等面向上有所受限。這樣的困境一直要到基金會董事的改選與鐵路公園的完成才有新的態勢發生。在這之後，具有「在地化」意涵的歷程出現了，一方面行動類型從「經驗疏遠」轉化到「經驗親近」；另一方面領導習性從「理念先行」轉為「實做先行」。如此，才能在核心場域與邊緣場域之間形成共同「關注的興趣」。也許，這偶有曲折卻處處驚艷的過程難以用一句話形容，但現在看來，藝文起家的新港文教基金會，某程度正是在這個「在地化」歷程中逐步取得改革正當性，並層層跨越不同場域。只不過，這一跨走了二十年。

參考文獻

- Bourdieu, P. 著，蔣梓驊譯，2003〔1980〕，《實踐感》，南京：譯林。
- Evans-Prichard, E. E. 著，趙旭東等譯，2002〔1940〕，《努爾人》，北京：華夏。
- Geertz, C. 著，納日碧力戈等譯，1999〔1973〕，《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
- Geertz, C. 著，楊德睿譯，2002〔1983〕，《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台北：麥田。
- Silverman & Gulliver 編者，賈士衛譯，1999〔1992〕，《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台北：麥田。
- 李丁讚，2004，〈公共領域中的親密關係：對新港和大溪兩個街道個案的探討〉《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
- 李芳玲，1998〈漢人社會的參與：以嘉義新港中山路的美化造街為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論文。
- 林群桓，2003，〈地方史使用與社區共同體建構：以新港的文化再現為例〉，南華大學亞太所碩士論文。
- 林秀幸，1997，〈重建鄉村社群：新港文教基金會的成立過程與組織探討〉《思與言》35(3)。
- 吳明儒、陳竹上著，〈台灣社區發展組織政策變遷途徑之探討〉，收錄在，李天賞主編，2005，〈台灣的社區與組織〉，台北：揚智。
- 。昭和十五年，〈新巷莊勢要覽〉。
- 葉玲伶，2005，〈非營利事業產業化——以新港文教基金會與新港客廳為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 新港文教基金會，2000，〈對話新港〉，新港文教基金會。
- 〈新港國民小學創校一百週年特刊〉。